

另闢蹊徑解決香港貧窮問題

周八駿

鑪峰 遠眺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行政長官候選人李家超在其選舉政綱中提出，「推行解決跨代貧窮的試驗計劃，設定範圍和計劃內容，扶持居住在「劏房」的貧窮家庭兒童，目標是促進官商民合作，發動社會一同扶持其生活、學習、個人發展等需要。」李家超表示，首個試驗計劃將選取居住在「劏房」的1000名貧窮家庭的初中學生。

對此，4月30日在7家電子媒體聯合舉辦的答問會上，有人質疑千人計劃與兒童配對發展基金類似，為何不把千人計劃變成恒常計劃，擴大至更多青少年？李家超回答稱千人計劃包含4層意思。首先，他強調理念重要性，即：解決香港跨代貧窮問題要有目標對象，最需要幫助的是居住在「劏房」的初中學生。其次，他同意政府應以不同計劃幫助香港所有青少年成長，不排除今後特區政府幫助青少年成長的其他計劃與幫助居住在「劏房」的千人計劃相融合。第三，特區政府要維護財政穩健，公帑應花在最有成效的計劃上，比分散注意力要好，所以，以千人為規模來試行。最後，千人計劃最重要是希望企業、社會團體、非政府組織以解決香港跨代貧窮問題為目標，共同努力。

貧窮問題困擾香港久矣！特區第四屆政府重視香港

貧窮問題。2013年政府首次設立官方貧窮線，訂在住戶收入中位數的50%。是年，政府首次公布《2012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當時，社會上有一種意見稱，既然政府制定了貧窮線，那麼，政府只要向處於官方貧窮線以下的居民再派148億港元，就能消除貧窮人口。當時，政府的回應是，官方制定的貧窮線不是「扶貧線」，理由是如果以公帑來資助脫貧，那麼，低收入人士就會減少工作誘因，從而，需要政府以公帑來填補的低收入居民與貧窮線之間的差額將會愈來愈多。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道理是對的。問題是，政府制定貧窮線如果不被用來作為扶貧目標，何必多此一舉？政府制定貧窮線，便是承認此線及以下的居民是貧窮人口。簡單地以公帑相助，當然不足取。但是，政府在鼓勵這些低收入居民就業上，是否做得足夠？

政府對在職低收入人口提供了交通津貼。但是，前提是低收入居民必須找到工作。至今，香港的經濟制度仍是大市場小政府，政府無法直接向低收入居民提供就業崗位。

另一方面，香港市場主體是中小企業，無力為低收入居民提供足以讓他們脫貧的就業機會。公私兩方面不足以向低收入居民「授人以漁」，唯有政府動用公帑「授人以魚」。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政府的恒常現金政策介入後，貧窮人口由政策介入前的約149萬減至近110

萬。2020年政府以「恒常現金、非恒常現金及須經濟審查的非現金福利」介入，亦即計及2020年全民派發1萬港元和其他防疫抗疫基金等特別措施後，貧窮人口才從165.3萬大幅降至55.4萬。新冠肺炎疫情百年一遇，政府政策措施非比尋常，代價是財政赤字動升，財政儲備銳減，是不可持續的。香港解決貧窮問題必須另闢蹊徑。

千人計劃貫徹共同富裕理念

我理解，第六屆行政長官候選人李家超在其選舉政綱中提出解決跨代貧窮的試驗計劃，便是另闢蹊徑。李家超指出，該試驗計劃最重要的是，希望香港的企業、社會團體和非政府組織，都關注香港跨代貧窮問題，都以結果為目標，來共同努力。所以，李家超如當選第六屆行政長官，會提出實施千人計劃的具體方案，會有邀請大企業、社會團體、非政府組織參與的具體安排。

千人計劃與特區第四屆和第五屆政府所有扶貧計劃的一個重要區別，是它貫徹共同富裕理念。共同富裕理念的前提是香港命運共同體理念。香港的企業尤其大財團明白香港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就會履行社會責任，以可持續方式協助政府扶貧。樹立共同富裕理念，就會協助政府抑制貧富差距。不能不指出，香港不少人依然承襲港英時代的自由資本主義理念，這是過時的觀念。香港特別行政區需要完善社會制度來解決貧窮問題。

名家指點



4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分析當前中國經濟形勢。會議強調，要努力實現今年經濟發展預期目標，並進一步明確，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同時強調，要促進平台經濟健康發展，完成平台經濟專項整改，實施常態化監管，出台支援平台經濟規範健康發展的具體措施。這意味著平台經濟的專項整改已經接近尾聲，政府對平台經濟的「強監管」政策可能會出現重大轉變。可見，政府對平台企業的態度，不再是反壟斷進行限制，而是強調平台廠商的發展。

4月29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在岸價收復6.59大關，收市報6.58兌1美元，比上一個交易日大漲249點子；人民幣離岸價收復了6.61大關兌1美元。內地股三大指數在當天午後大漲，上海綜合指數收市升2.4%，報3047點；深圳成分指數大漲3.7%，報11021點；創業板指數也飆升了4.1%，報2319點，兩市成交大增。香港恒生指數上漲4.01%或813點，報21089點；香港恒生科技指數更是上漲了一成以上，阿里巴巴等四大科技平台企業的股票更上漲了15%以上，及成交大增。金融市場如此強烈的反應，意味着政府對大型科技平台企業的「強監管」政策可能出現重大的轉向，讓投資者重拾對中國數字經濟的信心。

可以說，從2021年初政府開始對大型科技平台企業進行反壟斷及防止資本無序擴張的「強監管」政策以來，面對這種政策突然調整，不僅讓市場及平台企業不知如何應對，更是讓投資者對股市信心大大喪失。這不僅讓內地股市三大指數大跌，更讓香港恒生科技指數直線式下跌，其指數從2021年2月10686點，下跌到2022年4月18日3974點，下跌幅度達63%以上。本來，如果股市為政策所左右，政策的不確定性會增加股市之風險。如果政策的出台與實施更多的是隨意性，這自然更會增加這種政策不確定性的風險。面對這種巨大風險，投資者只能逃為上策。

易惠容

平台經濟「強監管」方式將出現重大調整

可以說，從2021年初政府開始對大型科技平台企業進行反壟斷及防止資本無序擴張的「強監管」政策以來，面對這種政策突然調整，不僅讓市場及平台企業不知如何應對，更是讓投資者對股市信心大大喪失。這不僅讓內地股市三大指數大跌，更讓香港恒生科技指數直線式下跌，其指數從2021年2月10686點，下跌到2022年4月18日3974點，下跌幅度達63%以上。本來，如果股市為政策所左右，政策的不確定性會增加股市之風險。如果政策的出台與實施更多的是隨意性，這自然更會增加這種政策不確定性的風險。面對這種巨大風險，投資者只能逃為上策。

可以說，數字經濟帶動了當前人類社會經濟的空前繁榮，中國更是分享了這種成果。不過，應該看到以數字經濟為主導的數字化技術，也引致了人類社會的劃時代變革及人的理性選擇方式的飛躍，由此形成了新的生產要素、新的交易工具、新的資源配置方式、新的產業組織形式等，並由此驅動了人類社會生活方式、人的行為方式及企業商業模式發展根本變革。而平台廠商是這種變革的主要載體。平台廠商的本質特徵是網絡效應。廠商之間競爭既不是市場價格的競爭，而是平台廠商之間的網絡協同化或策展機制的競爭。所以，競爭可以是平台廠商之間的競爭、平台廠商與平台參與者的競爭，及平台參與者與參與者的競爭。這自然導致了平台的網絡效應是多層次和極其複雜的。平台廠商的策展機制就是要促使平台廠商積極的網絡效應不斷擴展和做大，減少或排除消極的網絡效應。所以，平台廠商之間競爭性質與傳統渠道企業的市場競爭完全不同，平台廠商之間的競爭本質主要是策展機制的競爭或網絡協同化的競爭。

平台廠商競爭多樣化

可以說，數字經濟帶動了當前人類社會經濟的空前繁榮，中國更是分享了這種成果。不過，應該看到以數字經濟為主導的數字化技術，也引致了人類社會的劃時代變革及人的理性選擇方式的飛躍，由此形成了新的生產要素、新的交易工具、新的資源配置方式、新的產業組織形式等，並由此驅動了人類社會生活方式、人的行為方式及企業商業模式發展根本變革。而平台廠商是這種變革的主要載體。平台廠商的本質特徵是網絡效應。廠商之間競爭既不是市場價格的競爭，而是平台廠商之間的網絡協同化或策展機制的競爭。所以，競爭可以是平台廠商之間的競爭、平台廠商與平台參與者的競爭，及平台參與者與參與者的競爭。這自然導致了平台的網絡效應是多層次和極其複雜的。平台廠商的策展機制就是要促使平台廠商積極的網絡效應不斷擴展和做大，減少或排除消極的網絡效應。所以，平台廠商之間競爭性質與傳統渠道企業的市場競爭完全不同，平台廠商之間的競爭本質主要是策展機制的競爭或網絡協同化的競爭。

重振中國數字平台經濟

也就是說，如果平台廠商沒有網絡規模或非線性增長肯定是不成功的，但佔有巨大市場份額的平台廠商同樣可能出現四凹崩塌，關鍵就在於平台廠商的策展機制能否與利除弊。所以，數字經濟時代平台廠商的競爭與壟斷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傳統經濟理論中的市場結構、市場佔有率、市場支配地位、公平交易、反競爭行為、價格歧視等概念已經無法用來評估平台廠商行為是否為壟斷，否則容易導致嚴重的誤導。2021年中國對平台廠商的反壟斷，基本上還是以傳統概念及傳統標準作為判斷平台廠商壟斷與否的標準，這自然無法有效治理平台廠商的壟斷行為，也無法引導平台廠商走上健康發展之路，反之則導致了2021年內地數字經濟的全面收縮。可以說，當前中國經濟的嚴峻性，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與2021年對數字平台廠商「強監管」而導致數字經濟的全面收縮有關，所以，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對平台經濟政策的轉變，應該是一種政策糾偏，調整以前對平台廠商「強監管」的方式。如果是這樣，這將會重振中國的數字平台經濟，重振投資者的信心。但實際的效果如何，我們還得進一步觀察政府的政策取向，還得看政府對平台廠商的「強監管」政策是否出現真正的轉向。

亞洲貨幣暴跌衝擊香港經濟

香港經貿商會會長 李秀恒

商界 心聲



美匯指數(DXY)在4月份升幅超過5%，重上2020年3月以來逾兩年的高峰，全球的非美元貨幣都受到貶值壓力。一方面，由於美國聯儲局受到持續走高的通脹壓力，對加息採取果斷、積極的態度，「收水」步伐亦不斷加快，十年期美債收益率逼近3%，促使國際熱錢紛紛回流美國；另一方面，俄羅斯橫跨歐亞大陸，俄烏之間的地緣政治衝突，亦讓大宗商品價格高企，全球資金紛紛湧向避險貨幣，對歐洲及亞洲的經濟增長構成潛在威脅，歐亞資金出逃、貨幣貶值的現象尤為突出，形成對美元相對有利的環境。

亞洲貨幣遭受貶值壓力

其中，亞洲貨幣的下跌引起全球關注。今年以來，日圓兌美元、澳元和加拿大元均已累計貶值逾11%，是全球最弱勢貨幣，甚至比因戰爭而受到西方國家制裁的俄羅斯貨幣盧布還要疲弱。近日，日圓匯率跌至

20年來的低點，瑞士銀行早前更是下調了日圓兌美元的預測，6月目標由122降至130。

其實，亞洲貨幣(日圓除外)相對美元從年初至今已經累跌約3.5%，其中印尼盾及新加坡元已分別貶值約1%和2%，韓圓及新台幣則跌逾6%。人民幣方面，由於中國內地不同城市都出現了疫情，第二季經濟增長料將因不同程度的封控措施而疲軟，帶動人民幣出現短期貶值壓力，創逾一年以來低位，瑞銀對人民幣兌美元的6月目標亦從6.4降至6.55。

港元相對堅挺不利出口

相較之下，在聯繫匯率制度之下的港元，雖然匯價持續保持2019年8月以來的弱勢，逼近弱方兌換保證，但相對其他地區的貨幣，卻依然相對堅挺。這種現象，雖然對香港的普通消費者來講，在進口貨物、購買海外商品、外出旅遊公幹時都能享受到更低價格，但是對於出口卻屬於不利因素。

若回顧本港首2月的整體出口貨值數字，與去年同比上升10.6%，其中2月份輸往亞洲的整體出口貨值上升4.8%，而升幅最大的地區為台灣(40.4%)、印度(39.5%)、新加坡(14.6%)及越南(10.7%)，輸往

中國內地的貨值亦上升1.1%。然而，由於港元的相對堅挺，出口商品的價格競爭力減少，加之由於內地多個城市因疫情實施分區封城等封閉管理，令港企訂單量縮減且交貨期延長，成本上漲，香港貨物出口面臨一定的壓力。根據政府統計處最新公布的對外商品貿易統計數字，本港3月份的整體出口貨值錄得按年8.9%跌幅，其中輸往亞洲的整體出口貨值下跌8.6%，出口主要目的地中尤其以中國內地(跌12.8%)、日本(跌6.8%)、泰國(跌2.6%)和韓國(跌1.1%)最為顯著。

此外，雖然政府在4月21日實施首階段放寬社交距離限制，但第五波疫情的陰霾仍未完全散去，根據標普全球最新數據顯示，香港的採購經理指數(PMI)在3月份加劇收縮，從42.9跌至42，進一步遠離榮枯線50，為2020年4月以來的最大跌幅，反映出私營經濟連續三月收縮。

根據港府的最新預測，2022年首季度香港的GDP按年實質下跌4.0%，遜於市場預期的2%跌幅，是2020年第四季以來首次轉錄倒退。相信經濟下行的壓力在短期內會持續，但在俄烏局勢有所緩解、中國內地疫情緩和、全球供應鏈逐步恢復之後，隨着政府進一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下半年或會迎來轉機。

國民黨可以與民眾黨競合嗎

台灣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教授、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協會副理事長 潘錫堂

海峽 觀察



當國民黨近期表現令人失望，許多對民進黨當局施政不滿的民衆，將期待轉移到台灣民眾黨。台灣《美麗島電子報》不久前民調顯示，國民黨「好感度」邁入「死亡交叉」，不僅遠落後執政的民進黨，甚至還輸給民眾黨。

朱立倫接任黨主席以來，不僅連遭敗績，而且看不到有改善的起色；國民黨無法團結，究竟問題出在哪裏？試觀國民黨從四項「公投」、罷免及「中二」補選一路潰敗，看不到朱立倫有較積極的作為。在近期一份份面上多名政治人物信任指數的民調，朱立倫敬陪末座，而且民衆對國民黨的「反感度」變高，體現國民黨在朱立倫的帶領下，支持度還在滑落中。朱立倫為何不被信任？從侯友宜、盧秀燕及黃敏惠等藍營市長一致婉拒出任黨中央選舉提名委員可窺端倪，原因就是朱從未放棄參選2024的念頭，以致年底縣市選舉的提名作業心有所繫，未見公平公正客觀。

朱立倫對2024參選未斷念

此次朱立倫欲透過提名委員會營造團結的形象，卻遭連連婉拒，演變成黨中央整軍待發，卻未戰先自傷，這對雙方，猶如兩面刃。以侯友宜為主的國民黨籍縣市長們，雖在施政的績效上有不錯的口碑，勝選連任機會很高，但外在形勢變遷劇烈，加上國民黨形象

不斷滑落，使得他們為求自保，紛採與黨主席朱立倫保持距離的策略。但此種各自為戰的做法，相較於民進黨高懸經營旗幟、全黨齊進、媒體網軍側翼進逼的大兵圍攻戰，能否擋得住而不遭各個擊破，其實風險不小。

歸根究底，朱立倫主席必須要負起最大的責任，而他迄今最大的問題，即未能真正面對現實，始終對參選2024未曾斷念，以致無法真正放開胸襟、公正無私地扮演好黨主席應有的角色。即使前述侯友宜婉拒出任提名委員之舉，已體現彼此與朱主席之間溝通凸槌或默契互信有嚴重不足，然而客觀而論，一個「心有大志」的黨主席，很難做好國民黨主席應該做好的主要任務。如果朱立倫硬是要競逐2024，勢必會影響到他對黨務、選戰、人事的判斷和用心，導致黨內及支持者對他的各種質疑，惡性循環下去，最後只會害了他自己，更拖累整個國民黨。

再看《美麗島電子報》不久前的民調，在政黨好感度上，民進黨好感度為51.5%、民眾黨39.8%，國民黨則以28.2%吊車尾。民眾黨有兩個特點，第一個特點看似公開透明，但卻是同志之間互批、刀刀見骨；第二個特點是主要依賴一個政治明星，民眾黨若只靠一個柯文哲，注定重蹈親民黨的覆轍。目前民眾黨雖然好感度超越國民黨，但在一般民衆的心目中，大部分人還是認為國民黨是台灣的最大在野黨，主因在於國民黨始終居於制衡民進黨的正面戰場，而且選旗幟鮮明。前述民調，民眾黨的「好感度」高於國民黨，乃因在抗衡民進黨的議題上，國民黨負責正面戰場，也

承受着所有的後座力。但另一方面，國民黨「支持度」依然是民衆黨的好兩倍，可見許多人雖對民眾黨有好感，但並沒有轉化為支持。

民眾黨需要明確政治主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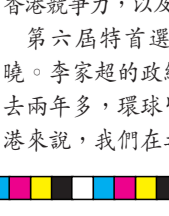
柯文哲首次競選台北市長，深綠標籤鮮明，但一路走來搖擺不已，現在一般把他歸類為「藍」，若依民調分析，其支持者也以藍營為主。柯為了避免被貼上「藍」標籤，經常刻意對藍綠各打五十大板。然而，柯文哲與民眾黨欠缺中心思想與價值觀，也沒有鮮明的政治主張，一切以選舉取向為最高考量。例如民眾黨不分區立委蔡壁如即坦言，民眾黨成立的目的，就是送柯文哲進「府」（意指志在「大位」）。然而，民眾黨要能勝選執政，就必須要有中心思想與治台的理念，民眾黨與柯文哲有嗎？

總之，若朱立倫真想團結國民黨打贏年底選戰，唯一正解即是公開宣布絕不參選2024，唯有斷了「大位」的念頭，才能重新贏得黨內的信任。而民眾黨要想在2024勝選，現在就要端出最大在野黨應有的政策主張。民眾黨必須主動出擊，從內部開始整合，有了清晰的政綱主張，再號召舉行「在野政黨會議」，凝聚在野勢力政策的最大公約數，此時的「藍白合」才是政策的整合而非職位的分贖。有了共同的主張，民眾黨與國民黨的競爭或合作即是單純「人選」的比較，選民自然會集中票源投給最好的人選，造成極大化2024能夠政黨再輪替執政的機率。

團結各界同為香港開新篇

新界社團聯會副會長 陶桂英

港事 講場



特首選舉候選人李家超日前公布政綱，強調要「同為香港開新篇」，當中提出四大綱領，包括強化政府治理能力；土地房屋提速、提效及提量；提升香港競爭力，以及共建關愛社會和增加青年上流機會。

第六屆特首選舉將於5月8日舉行，結果即將揭曉。李家超的政綱可說是未來香港發展的大框架。過去兩年多，環球皆受新冠疫情影響，危機四伏；對香港來說，我們在之前已飽受黑暴的禍害，社會陷入撕

裂，不少港人都悲嘆「日子難捱」。可幸，隨着中央落實《香港國安法》和優化香港選舉制度，加上中央支援港人成功遏制疫情，香港總算撥開雲霧，李家超提出「同為香港開新篇」的願景，也是港人的深切期盼。我們深信，好的行政長官要知人善任，與各界保持良好溝通，團結激勵港人，積極破解深層次矛盾，抓緊新的發展機遇。

令人欣喜的是在李家超的政綱中，我們看到他重視團隊合作的領袖特質。一方面，他致力重組政府架

構，強化政府治理能力，並強調立法行政關係，保持良性互動；另一方面，他亦表明將在18區成立社區服務關愛隊伍，團結及系統化社區力量，廣納人才到政府諮詢架構內。

所謂「得人心者，得天下。」我們理解香港不論在政治、經濟社會、融入大灣區發展，以至培育愛國愛港新生代等方面都充滿挑戰，但只要整個特區港團隊對內對外都能相互配合，自能齊心事成，在「一國兩制」的穩健基礎上，同為香港開新篇。